

审美现代性 与都市唯美风

——『海派唯美主义』思想研究

李雷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013061277

李雷
著

B83-062
02

『海派唯美主义』思想研究

审美现代性 与都市唯美风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北航

C1666956

B83-062

0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审美现代性与都市唯美风:“海派唯美主义”思想

研究/李雷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 - 7 - 5039 - 5630 - 0

I. ①审… II. ①李… III. ①唯美主义—美学—研究
—中国—现代 IV. ①B83 - 062 ②B83 - 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55467 号

审美现代性与都市唯美风

——“海派唯美主义”思想研究

著 者 李 雷

责任编辑 吴士新

封面设计 刘玲子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h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010) 84057691—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010)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15

字 数 18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5630 - 0

定 价 35.00 元



北航

C1666956

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导 论 审美现代性与唯美主义思想研究 / 001

第一章 “海派唯美主义” 发生论 / 021

第一节 租界场域中“都市漫游者”的现代性诉求 / 022

- 一、租界：现代上海的钥匙 / 022
- 二、“都市漫游者”与现代“文人” / 028
- 三、“异国情调”的想象叙事 / 032
- 四、身份的纠结：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 / 037

第二节 “老上海”的现代性景观 / 040

- 一、时空转换与“世纪末果汁” / 041
- 二、感性解放与审美自觉 / 045
- 三、消费文化与唯美表征 / 049

第三节 “世纪初唯美主义”的前奏性作用 / 060

- 一、唯美主义与五四现代性启蒙 / 061
- 二、徘徊于唯美与浪漫之间的早期创造社 / 075
- 三、唯美主义的浪漫化与启蒙化改造，以“莎乐美”为例 / 086

第二章 “海派唯美主义” 文人共同体及其代表 / 095

第一节 “五四”之后的海上文坛 / 095

- 一、思想文化的“失序”与道德价值的“失范” / 096
- 二、文艺的高蹈与商业化并存 / 098

第二节 “海派唯美主义” 文艺社团 / 100

- 一、狮吼社 / 101
- 二、幻社 / 105
- 三、《真美善》作家群 / 108
- 四、绿社 / 110

第三节 叶灵凤——“中国的比亚兹莱” / 112

- 一、英国的比亚兹莱 / 112

二、叶灵凤与比亚兹莱	/ 118
第四节 早期邵洵美——中国的“唯美主义传道士”	/ 125
一、“恶之花”似的唯美诗歌创作	/ 128
二、“老克勒”式的唯美生活实验	/ 139
第三章 “海派唯美主义”诗学品格	/ 143
第一节 “为艺术而艺术”	/ 144
一、艺术与时代：“打倒有时代观念的工具的文艺”	/ 146
二、艺术与自然：“表现自己身体底艺术与本能是人生真趣的享受”	/ 148
三、艺术与道德：“于丑恶中寻出美”	/ 152
第二节 “为艺术而生活”	/ 160
一、“生活本身是首要的也是最伟大的艺术”	/ 161
二、从自我塑造到“生活艺术化”	/ 167
第三节 “海派唯美主义”：西方唯美主义的感官化与庸俗化	/ 171
一、唯美主义：审美现代性的初始话语	/ 171
二、唯美主义的悖论性品格	/ 176
三、反叛内核的抽离与唯美颓废的偏执	/ 180
第四章 “海派唯美主义”价值批判	/ 186
第一节 “世纪初唯美主义”与“海派唯美主义”	/ 186
一、直线性时间观念与断裂性时间观念	/ 187
二、精神超越之美与官能享乐之美	/ 192
三、群体崇高之美与个体颓废之美	/ 196
四、以“感性启蒙”之名：美育话语与耽美话语	/ 201
第二节 革命年代的审美乌托邦构想	/ 210
一、“海派唯美主义”与中国现代新文艺的发展	/ 211
二、“海派唯美主义”与中国现代美学体系的完善	/ 213
结 语	/ 219
参考文献	/ 223
后 记	/ 234

1. 关于唯美主义

“唯美主义”(Aestheticism)最初是产生于19世纪中后期的法英两国而后逐渐波及整个欧美地区的一股文艺思潮,它上承浪漫主义,下启现代主义,为文学艺术脱离于政治、道德、信仰等外在规训束缚而走向真正的分化与独立起到了重要的奠基性作用,一定意义上而言,唯美主义真正开启了西方文学艺术的自觉时代。

溯源唯美主义,其诞生并非历史偶然,“是在19世纪后期宗教信仰衰落之后出现的”^①。自然科学的发展与进步以及与之相随的宗教确定性的日渐崩溃,使得以往维系人们日常生活行为规范的基督教道德价值体系丧失其传统的效用,人们普遍陷入怀疑、苦闷、彷徨乃至绝望之中,这种情绪的蔓延便形成了西方19世纪后期的“世纪末”情绪。此种“世纪末”情绪弥漫于整个欧洲之际,部分怀揣浪漫理想的现代“文人”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庸俗市侩的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之风的极端厌恶以及对文学艺术商业化趋向的深切忧虑,积极地从康德的“纯粹美”与“审美无利害”说和爱伦·坡的“纯诗”理论等中汲取思想资源,打出“为艺术而艺术”的旗号,试图通过构筑纯美的艺术象牙塔来对抗丑陋庸俗的现实和守卫文艺审美的纯洁领土,并逐步在19世纪后半期的欧洲文坛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唯美主义思潮。其中的代表人物大体包括英国的斯温伯恩、佩特、王尔德、比亚兹莱、道生、摩尔,

^① Leon Chai, *Aestheticism: The Religion of Art in Post-Romantic Liter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ix. 转引自周小仪:《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

法国的戈蒂耶、波德莱尔，美国的惠斯勒，意大利的邓南哲等，尽管他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但他们皆倾向于把“为艺术而艺术”作为唯美主义的核心诗学理念。

“为艺术而艺术”可谓是唯美主义一以贯之的文艺理念和美学主张，也是其诗学理论最言简意赅的概括。由该口号衍生出的唯美主义诗学主张大体包含以下几点：第一，一切艺术都是无用的。要求摒除各种对待艺术的工具主义与实用主义动机，肯定艺术有不依赖于政治任务、社会需要、教育使命等的独立性，强调文艺的本体与价值存在于文艺自身，并将文艺自身的美作为其最高价值和终极旨归所在。第二，形式就是一切。艺术作品的价值取决于其形式，艺术作品的美仅存在于自身形式的完美之中；形式具有意义生成的功能，内容是作为形式的辅助性因素而存在，因此，艺术创作应以追求形式为目标，而最高的形式是没有任何具体内容的抽象的装饰。第三，唯美与感性至上。既然艺术无关乎政治、道德、时代、社会等外在因素而唯美是求，并且美感与人之感性生命体验息息相关，所以，追求艺术之美便与感性生命的自由与解放相关，美的艺术应打破伦理道德禁忌而充分挖掘与表现生命中的瞬间美感体验。唯美主义的上述诗学主张使唯美性文艺与庸俗的资产阶级艺术截然区分开来，但其对文艺自律性的强调却在强大的商业文化逻辑面前败下阵来，在经济压力的胁迫之下，唯美主义者不得不寻求自我及其艺术的商品化，这就导致了唯美主义的另一副面孔，即将唯美精神付诸于日常生活实践，主张以艺术的精神来对待生活，宣扬一种“为艺术而生活”的生活艺术化主张。这是唯美主义不仅作为一场文艺思潮而且作为一场社会改造运动的典型表征，亦是其区别于其他诸如象征主义、自然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等文艺思潮的标志之一。显然，唯美主义在艺术与生活双重维度上的理论主张存有明显的矛盾之处，而唯美主义之所以存在这种诗学悖论关键就在于其与商品消费文化之间的异质同构关系。

唯美主义纯粹而新颖的文艺审美理念和生活主张以及以波德莱尔、王尔德等为代表的唯美主义者纵情尽性、放浪形骸的言行举止，不仅是对资产阶级庸俗化、商业化文艺审美旨趣的强有力反拨，也构成了对资产阶级道德价值体系的公然挑衅，因此，唯美主义作为一场文艺思潮和社会改造运动，其虽历时并不长，但从其诞生之日起便争议不断，备受瞩目：一方面，它消解了传统的文艺审美理念，其对艺术商业化与功利化的拒斥和对艺术自律性与

独立性的捍卫,实现了西方文学艺术的真正自觉;另一方面,它间接催生了人们对维系日常行为规范的伦理道德体系的合理性反思,使得艺术家、理论家将关注的重心由文艺的外部因素转向文艺的内部因素,而且其对艺术形式美的强调与追求,借助象征、隐喻、反讽等艺术手法对丑、颓废等“恶中之美”的挖掘,大大丰富了艺术的表现手法,拓展了艺术的表现力和审美领域,对于后来的印象主义、象征主义等文艺思潮起到了重要的诱发性作用。但遗憾的是,唯美主义漠视文艺的社会性与思想性而耽于艺术形式美的诉求难免导向形式主义,而且以维护文艺审美自律为初衷的唯美主义者在与庸俗资产阶级针锋相对的斗争之中,逐步走向了非道德、反自然和反时代的“美的偏至”和无限夸大艺术审美功能的审美乌托邦,并流露出沉溺于肉身快感体验的享乐主义与颓废主义倾向,于是,名噪一时的唯美主义随着其标志性人物王尔德的锒铛入狱而渐趋式微。

2. 关于中国现代唯美主义思想研究

唯美主义在欧洲文坛的销声匿迹,并不意味着其完全地退场。20世纪初,它漂洋过海登陆日本,并很快形成了以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为代表人物的唯美主义文学流派。而此时的中国正深处于内忧外患乃至亡国灭种的危难情势之中,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激励着觉醒了的现代知识分子在努力寻求政治体制与思想文化等变革的同时,积极地“别求新声于异邦”,渴望从异域文明寻求国富民强之路径。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和田汉等为代表的留日文人适时地发现了唯美主义思想在反抗传统与现代性启蒙方面的积极性价值,便纷纷展开对唯美主义的广泛性译介与浪漫化、启蒙化改造以服务于“五四”时期的启蒙救亡使命,并且很快在现代中国引领起一股唯美主义文艺热潮,这便是唯美主义中国化的最初表现形态。但随着“五卅惨案”的发生以及创造社由“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的慢慢转向,唯美主义在五四现代性思想启蒙进程中所发挥的功能亦日渐弱化。而此时恰逢滕固、章克标、邵洵美等深受唯美主义影响的上海文人留学归来,他们所标举的包含有“世纪末”情感的唯美主义思想恰与“五四”之后思想文化界普遍苦闷与彷徨的精神状态相契合,加诸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日益繁荣的商业文化对文学艺术领域的侵蚀,这些外在的现实思想文化条件使得他们更加有信心和热

情来传扬唯美性文艺思想,于是,他们便借着早期创造社宣扬“为艺术而艺术”的余热继续大力译介唯美主义思想,并积极模仿西方唯美派进行文艺创作。在他们的积极努力之下,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产生了幻社、绿社等唯美性文艺社团并由此而促发了唯美主义思想在老上海的复兴。尽管这一思想带有明显的不合时宜性,但凭恃海派唯美文人不遗余力地宣扬效法和其本身鲜明而独特的文艺理念,其在政治与伦理的双重挤压之下仍然博得了一定的生存空间并产生了一定的话语影响力。但其微弱的话语影响力很快便被占据主流话语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话语所遮盖和湮没,并因其与马克思主义文艺审美观念存有相互抵牾之处而被定位为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文艺领域的反映,这一性质定位直接导致了长期以来“海派唯美主义”思想在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上被规避的命运,甚至大家对“唯美”等字眼讳莫如深,而往往借用同出一语(Aestheticism)的“审美主义”来代替“唯美主义”,对唯美主义思想更是唯恐避之不及,这种状况直至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唯美主义的认识愈加成熟方才渐渐有所改善。

受西方有关唯美主义的学术研究热潮^①的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降,国内学界已基本告别了以往谈“唯美”色变的年代,而对唯美主义表

① 有关唯美主义的西方学术研究,基本上可以20世纪90年代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90年代以先对其的研究多是历史研究,集中于对唯美主义的发展脉络、典型人物的具体思想和代表作品以及其与其他种文艺思潮的关系等问题的探析,代表性的成果包括 Waiter Hamilton, *The Aestheticism Movement of England*, New York and London: Garland, 1882; William Gaunt, *The Aesthetic Adventure*, London: Jonathan Cape Thirty Bedford Square, 1944; R. V. Johnson, *Aestheticism*, London: Methuen, 1969; Holbrook Jackson, *The Eighteen Nineties: A Review of Art and Ideas at the Clos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righton: The Harvester Press, 1976; Leon Chai, *Aestheticism: The Religion of Art in Post-Romantic Literature*, Columb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其中以威廉·冈特的《美的历险》和约翰逊的《美学主义》最为人所熟知,也是研究英法唯美主义的较权威性著作。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欧美学界对其的研究由侧重于唯美主义历史的爬梳和具体作家作品研究的传统模式中分裂出一类侧重文本分析之外的社会历史材料的文化研究模式。该模式为唯美主义研究提供了诸多新颖的视角,使其一些以往不为人知的层面得以揭示,从而有效地推动了唯美主义研究的拓展与深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 Regenia Gagnier, *Idylls of Marketplace: Oscar Wilder and the Victorian Public*, Aldershot: Scolar Press, 1987; Jonathan Freedman, *Professions of Taste: Henry James British Aestheticism and Commodity Cultur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Gene H. Bell - Villada, *Art for Art's Sake and Literary Life*, 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6. 在这些突破性著作中,西方学者从商业文化、视觉文化等视角探讨了唯美主义的性质,并揭示出唯美主义者的文艺和生活实践与其所宣扬的文艺自律性思想的背离,凸显了唯美主义自身复杂而矛盾的品格。参考周小仪:《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绪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页。

现出日渐浓厚的研究兴趣,不断有人尝试着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来对唯美主义的历史脉络、代表人物、经典文本、诗学理念、谱系与影响等进行系统的介绍与研究,和客观的分析与评判,并因此诞生了诸多可喜的研究成果,其中既有作品选编,也有理论专著^①;既有唯美人物传记,亦有唯美作品赏析;既有片断式论述,亦有专题式介绍;还有许多学术性论文,尽管这些理论成果的水平参差不齐,但无疑为改变人们关于唯美主义的传统认知起到了一定的纠偏作用,也为我们全面而深刻地认识唯美主义提供了诸多可供参考的研究路径与思想材料,并有效地推动了国内唯美主义研究不断地走向细化与深入。

综合现有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近年来唯美主义研究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背后,实际上隐含着一些尚不尽如人意乃至值得商榷之处。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国内学界关于唯美主义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西方唯美主义,而对中国现代唯美主义的研究则相对比较薄弱。从现存的关于中国现代唯美主义思想研究的成果来看,其研究重心也大多集中于西方唯美主义在中国现代的传播与影响研究和中国现代唯美性思想的历史演变研究,而缺乏对中国现代本土化的唯美思想独特理论品格的关注,而且对于“海派唯美主义”的研究一直处于不冷不热的温吞状态,即便论及大多也是将其作为中国现代唯美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来加以简单地概括与分析,而鲜有把其作为一个独立而有价值的课题加以研究。可见,国内的唯美主义研究存在着明显的“厚西薄中”缺陷,以海派唯美性思想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唯美主义思想的重要性也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该问题亟待后人加以解决。

^① 据笔者目前收集到的相关成果主要有:赵澧、徐京安主编:《唯美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刘钦伟选编:《中国现代唯美主义文学作品选》(上下册),花城出版社1996年版;周小仪:《超越唯美主义:奥斯卡·王尔德与消费社会》(英文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解志熙:《美的偏至》,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薛家宝:《唯美主义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肖同庆:《世纪末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殷曼婷:《唯美主义辨》,载于《唯美》,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第1辑(此文涉及当代大众文化中的唯美主义倾向,不在中国现代唯美主义思想研究之列,故仅仅把其列出,不作进一步研究);周小仪:《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张伟编:《花一般的罪恶——狮吼社作品、评论资料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张介明:《唯美叙事:王尔德新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李元:《唯美主义的浪荡子——奥斯卡·王尔德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

第二，中国现代唯美主义思想的研究之所以相对薄弱，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唯美性文艺由来已久的价值偏见。长期以来，国内学界普遍将唯美主义视为堕落颓废、悲观厌世的代名词，将现代作家摄取“世纪末果汁”而仿作的带有唯美倾向的文艺作品视为在风雨激荡的“十字街头”筑造“象牙塔”的逃避现实之作，是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文艺领域的彰显。因此，现代唯美派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以先的主流文学史、文学思想史话语中一直是被规避的对象或被边缘化的文艺美学风格，即便有所提及也多是以主流意识形态对立话语的面目出现，难逃政治性或道德性批判。事实上，这种完全从现实功能需要出发的文艺批评范式不仅与文艺审美的固有属性和内在发展规律相违背，极其容易导致文艺创作的政治化与工具化，而且可能造成对作家主体意识及其文艺审美旨趣的破坏与抹平，与现代人道主义精神相背离，因而难以对唯美人物及其作品做到恰如其分的评判。如此看来，需要我们尽量摆脱传统意识形态话语的框范，而将其置于中国社会现代性全面转型这一宏大文化场域之中来探讨其隐而未显或者说长期被遮蔽的积极价值所在。

第三，因局限于相对狭隘的研究视域和文艺思潮研究的固定模式，国内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是爬梳其来龙去脉的史料研究和解读唯美性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而缺乏对中国现代唯美主义整体诗学品格及其现代性生成语境的应有关注。以往研究尽管在思想承续性研究方面保有优势，但失却了对唯美主义诗学生成动力之源的探究及对其复杂理论形态的解析，或者仅把唯美主义的成因简单归结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祟的结果，而难以触及唯美主义的内在生成逻辑，更难以看清现代性商业文明对于“海派唯美主义”的诱发与刺激作用。这些研究局限势必会影响人们对于海派唯美性文艺的价值衡量及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地位判定，故欲对海派唯美人物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和对其文艺文本进行令人信服的阐释，必须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寻求研究视角的拓宽与创新。

总体而言，目前学界对于中国现代唯美性文艺尤其是“海派唯美主义”思想的研究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而仍具广阔的可拓展空间和可挖掘余地。正是基于此，本书尝试在前人搭建的研究平台上对其做进一步的探赜索隐，以期为当下方兴未艾的中国现代唯美主义研究做一些有益的补充性工作。

3. 关于“世纪初唯美主义”和“海派唯美主义”^①

为便于研究,本书将根据唯美主义在中国现代不同历史时段的特质将其大体划分为“世纪初唯美主义”与“海派唯美主义”两类。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二者基本上是唯美主义在现代中国的两种表现形态,都是中国现代文人结合时代文化语境与各自需求对唯美主义进行有意或无意“误读”与“整形”后的产物。

大致来讲,“世纪初唯美主义”是对20世纪初期中国现代文坛上出现的唯美主义译介盛况、围绕“为艺术而艺术”所展开的文艺思想论争以及唯美性文艺创作热潮等文艺现象和文艺活动的宽泛性统称,而并非是对20世纪初某一文艺流派的框定与特称。其作为唯美主义被引入现代中国后的最初表现形态,主要是被以早期创造社成员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用来服务于启蒙救亡的宏大时代主题,唯美主义批判现代性的反叛性精神被抽象化并被灌注以反封建、反传统的现代性启蒙新内涵,可以说,“世纪初唯美主义”是20世纪初期被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启蒙化和浪漫化改造后的唯美主义,启蒙是其本质属性之一。

“海派唯美主义”则相对比较具体,是指由活跃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海上文坛、热衷于译介和仿作唯美主义文艺作品并效法西方唯美派追求“生活艺术化”理想的几个文艺社团——狮吼社、幻社、绿社和《真美善》作家群等所共同促成的唯美性思潮。这些文人团体在文艺理念上的唯美性与自律性诉求及其代表成员在生活层面上的艺术化乃至感官享乐主义追求,与唯美主义的典型症候颇为接近,因此被我们视为“海派唯美主义”思想的代表,它们关于唯美主义的一切活动构成了唯美主义在现代中国的第二种表现形态。相比“世纪初唯美主义”,该种形态则存在着对唯美主义感官化与庸俗化的偏颇,或者说其过于强调文学艺术中的感性生命体验与审美体验而相对忽视了唯美主义反思与反叛现代性的层面,在某种程度上讲,“海派唯美主义”将对感性主体意识的肯定与对现代商业文明的认可皆统合于对现代性的积极追求之中。换言之,“海派唯美主义者”是把唯美主义与现代消费文化同时

^① 此处仅是关于二者的一般性概念说明,具体的分析与比较请见本书第四章第一节的内容。

作为先进的现代性文明的组成部分而加以欣然接受的，置身“老上海”发达的现代物质文明景观之中的他们难以洞察现代性的弊病与问题所在。所以，“海派唯美主义”对于文艺自律性观念的强调，并未指向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而是用于对以下核心理念的凸显：一、感性对于现代人而言具有本体论地位，美来自于感性生命解放所带来的快适体验；二、生活艺术化，以艺术审美的态度对待生活，追求游戏式的享乐人生。^①由此，对于自由感性生命的崇尚和艺术化生活的向往构成了“海派唯美主义者”的集体诉求，从而在文学与生活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共通性，并演化成某种鲜明的文艺旨趣与美学风格。

当然，正如杨义先生所言，“海派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流派。它是一种租界文学，或洋场文学，是以特定的地域文化为依托的历史文化现象”^②，在此基础上生成的“海派唯美主义”同样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艺流派（它从来没有形成一种真正的“文艺流派”），因为毕竟这些文艺团体与正宗的唯美主义之间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皆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所以说，“海派唯美主义”并非是明确而具体的文艺流派，更多的时候代表了一种共同价值立场的选择，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话语的表达，也许作为单独的文人团体，其本身的文学价值与文学史意义并不大，但作为特殊年代的某种鲜明价值立场与美学风格颇值得玩味，尤其对于中国现代美学体系的建构和完善颇为重要。

二

如前所述，对中国现代唯美性文学的批判之所以能在社会上引发广泛共鸣，并最终导致唯美性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迅速退隐，除其自身的问题之外，关键在于主流革命话语避而不谈唯美性文学在纯文艺领域中的贡献，巧妙地避开了文学审美的自律性话题，而是从危急存亡的历史情势和名正言顺的道德教化层面上直指唯美主义者颓废的生活方式和淡漠的爱国情怀，并抬升至国家政治层面上加以“口诛笔伐”。显然，这是一种淡化文艺

^① 此处参考了刘小枫关于作为现代性的审美性的实质所包含的基本诉求的论述，参见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07页。

^② 杨义：《论海派小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第2期。

本体而过度强调文学与时代、社会、道德和政治等关系的文学外部研究方式，这种研究方式对于全面深入细致地探究唯美主义文艺思想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除此之外，我们还需对其内在的审美价值与其独立自足的话语符号系统进行评定，即是说，将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相结合，既要还原其生成的现代性文化场域，又需注重其文本自身，探究其内在的“文学性”与审美性。鉴于此，我们对于海派唯美性文艺的研究就需要突破以往的简单化批评模式而采取一种内外兼顾的研究方式。从内在性质上讲，诚如卡林内斯库所言，唯美主义所宣扬的“‘为艺术而艺术’是审美现代性反抗市侩现代性的头一个产儿”^①，唯美主义标志着审美现代性的发生，唯美主义文艺可谓是审美现代性的初始话语；从外部关系来讲，唯美主义的产生与外在的现代性文化场域息息相关，而审美现代性恰恰又是现代性的内在维度之一，所以说，唯美主义从其产生之日起便被盖上了审美现代性的印戳，无论是对唯美主义文艺的内部研究抑或外部研究都难以绕开审美现代性话题，正基于此，本书对“海派唯美主义”思想的研究便主要是从审美现代性视阈之下展开的。

1. 何谓“审美现代性”？

既然以审美现代性作为研究的参照视域，势必需要对“审美现代性”的基本内涵有一大体的界定。

谈及“审美现代性”首先要涉及“现代性”，因其本身即是现代性的有机组成部分。而“现代性”是一个极为重要又十分复杂的“星丛”式概念，它与“现代”、“现代化”、“现代主义”等概念既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有诸多差异，它包罗万象、充满矛盾而又富含张力，并处于不断丰富与变化之中，故很难对其作出清晰而具体的本质性界定。大体而言，现代性是人类社会从前现代向现代过渡过程中在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知识理念体系和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及其相应的文化制度等方面所发生的全方位立体式转型^②。换言之，现代性不仅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转变和趋于合理完善，而且表现为人的转变，人的欲念、情感、精神等内在结构本身的转变，或者说表现为人

^① [美] 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第 52 页。

^② 参见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1-61 页。

之主体性的自觉，而具备主体性的“现代人”的生成是以社会组织和结构模式的合理性与现代化为前提的，现代人对主体性的张扬与追求又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合理性进程，二者交互作用共同促进现代性的发展。鉴于此，自启蒙运动以来所确立的“主体性”与“合理性”原则，便成为现代性在个体层面与社会层面上的显在标志或本质规定，成为诸多现代性理论的两大核心论域。

从个体层面上来讲，现代性集中表现为人之主体性的自觉。近代宗教改革运动以及随后的基督教分裂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促使人们对宗教神学统摄下的传统超验因素、道德伦理、价值标准等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他们试图突破宗教所设立的层层框囿而积极寻求对个体生命情感、欲求等的正视以及自由运用理性的权力，人们的关注重心开始由神本体向人本体转换，这便是人的主体性觉醒的显著标志。康德第一次从哲学高度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原则。在他看来，人不仅是自然的立法者，而且是自身的立法者，“人只有作为意志主体、道德主体才能达到真正的最高自由，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尊严”^①，当然，其主体性哲学是建基于“人主要是一种理性存在”这一说法。黑格尔则明确将主体性原则视为现代性的中心，他所谓的主体性主要包括个人主义、批判的权力、行动自主性和自我意识等四个层面，而主体性的核心主题便是自由，只有拥有充分的主体性自由，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可见，主体性原则包含着强烈的人本主义意蕴，这正是现代性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社会层面上讲，现代性主要意味着社会的理性化。在马克斯·韦伯看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过程（社会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的现代化过程）即是社会诸多“价值领域”不断分化并获得自身“合理化”的过程。现代性的明显征候即表现于传统社会整合统一的宗教——形而上学世界观的逐渐解体，宗教事物与世俗事物、社会事物与文化事物的显在分化。在此过程中，康德意义上的知、情、意（对应于现代知识谱系中的科学、艺术和伦理）逐渐摆脱宗教信仰的权力话语钳制而走向相对的分离与独立，作为分化产物的科学、伦理和艺术，他们的合理性价值依据不再归诸于传统的宗教而是其自身。具体到艺术活动，道德意图的判断被趣味判断所取代，审美价值取代宗教伦理价值成为独立判断艺术品的合法化依据，即是说，艺术审

① [德]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探本》，唐钺重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3页。

美从现代知识结构中分化出来,形成相对独立的思想与精神领域在现代思想谱系之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审美现代性的发生正是建立在艺术审美的独立基础之上,所以说,审美现代性可谓是现代性展开过程中分化的产物,其本身构成了现代性的一组成要素。

但是,现代社会在标举主体性与理性并将自身的现代性转型不断向前推进的同时,却逐步显露出某种“衰颓的征象”,这不仅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不断膨胀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而不断恶化,而且表现在人与社会、自身的关系上出现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危机,这很大程度上源于现代性两大核心原则自身的分裂。首先,人的主体性包含着理性主体性和感性主体性的双重维度,但现代社会的发展无疑过度张扬了人之理性主体性层面而相对忽视甚至严重压抑了人之感性因素在主体性中的作用,从而造成了现代人性的分裂,以至于人慢慢沦为单向度的“理性人”存在。于是,注重感性的“美学”便适时地出现在现代性知识体系之中,根据现代“美学之父”鲍姆嘉滕的界定,美学就是“自由艺术的理论、低级认识论、美的思维的艺术和与理性类似的思维的艺术,是感性认识的科学”,其目的是“感性认识本身的完善(完善的感性认识),而这完善也就是美”^①。如此一来,现代性之中便产生了通过审美来彰显人之感性主体性的审美现代性一维,审美现代性显然包含着对人之“主体性”的捍卫与肯定,但也包含着对理性主义观念的质疑与否定,因为人之主体性的分裂是同理性原则的失衡紧密相关的。韦伯在分析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历程时将理性区分为价值理性与目的理性(为凸显其对手段的倚重及其实用品格,后人将其称为“工具理性”)两种面相,其中,价值理性强调行为的自身价值,而工具理性则注重通过精确计算功利的方法以求目的的最有效实现。韦伯认为,新教改革时期的清教徒将勤俭精神和工作伦理与获取上帝救赎有效结合在了一起,从而实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完满统合,并由此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但随着资本主义在制度层面上的不断理性化和在文化层面上的不断世俗化,宗教渐趋式微,其不再能够提供约束工具理性的价值目标,效率与金钱遂成为人们的行为价值主导。在这种情况下,工具理性逐渐僭越其工具位置而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并渗透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于严密组织的官僚科层体制中的个人犹如置身

^① [德] 鲍姆嘉滕:《美学》,简明、王旭晓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8页。

于“铁笼”之中而沦为机械的“职业人”和“秩序人”。面对工具理性独霸的资本主义现实以及个人因宗教衰落而带来的生命意义缺失之难题，韦伯的解答是审美因其对感性的注重和其无功利性原则而具有将主体从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铁笼”中解救出来的救赎功能。诚如其所言，“生活的理智化和理性化的发展改变了这一情境。因为在这些状况下，艺术变成了一个越来越自觉把握到的有独立价值的世界，这些价值本身就是存在的。不论怎么来解释，艺术都承担了一种世俗救赎功能。它提供了一种从日常生活的千篇一律中解脱出来的救赎，尤其是从理论的和实践的理性主义那不断增长的压力中解脱出来的救赎”。^① 强大的世俗救赎功能势必使得艺术在现代性思想系统中地位得以凸显并作为一种不可替代性的文化力量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但不难看出，审美对人性的弥合作用以及艺术世俗救赎功能的发挥皆是以对现代性进步和实用科学等启蒙现代性观念的批判乃至否定为前提的，由此艺术审美势必构成现代性的反叛力量，也就是说，作为现代性产物的美学，同时又是现代性中的异己力量。这一方面凸显了现代性自身复杂的内在张力结构，诚如卡林内斯库所言，“无法确言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可以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却又剧烈冲突的现代性。可以肯定的是，在19世纪前半期的某个时刻，在作为西方文明史一个阶段的现代性同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之间发生了无法弥合的分裂。（作为文明史阶段的现代性是科学技术进步、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带来的全面经济社会变化的产物。）从此以后，两种现代性之间一直充满不可化解的敌意，但在它们欲置对方于死地的狂热中，未尝不容许甚至是激发了种种相互影响”^②。另一方面，这表明了审美现代性与生俱来的两面性及其所包蕴的深刻人道主义内涵。因为就其从感性出发捍卫人的主体性来看，其与现代性是一致的；但若从以感性原则来对抗理性主义权威这一层面上看，其又是反现代性的。其对情感、欲望等感性生命要素的尊重及其对日常生活的惯例化、理性化的反拨，是对现代人之主体性原则的一种完善，更是对现代人道主义精神的一种张扬。所以说，脱胎于现代性的

① H. H. Gerth and C. W. Mills eds.,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 342. 转引自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57页。

② [美] 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7-48页。